

回忆恩师 我的引路人

李建强

(1954~)，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标本馆馆长，研究员。1987~1990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

吴征镒先生对于我来讲是恩重如山，可以说我能走上植物学研究这条道路，其中的每一步都可以体现出他对于我的指导、关心和帮助，往事历历，铭记在心。收到昆明植物所的征稿函后我想了许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无论如何都应该写点文字来纪念我的恩师。

我1982年毕业于湖北大学并留校任教。1983年10月初在太原开了全国植物学大会，会议期间湖北大学毕列爵教授向吴征镒先生提出希望派人到昆明植物所进修植物分类学的请求，吴先生非常愉快地答应了，并且指派陈介研究员作为指导老师，具体负责。湖北大学生物系领导和毕列爵教授分别找我谈了此事，我当然十分赞同他们的想法，决定去昆明植物所进修。我在昆明的两年，开展了云南猪屎豆属的分类学研究工作。除了看标本外，我还随李恒研究员等到西双版纳调查采集，和陈介研究员的硕士研究生崔献举到鹤庆等地采集，平时学习了Laurence 1951年版本的维管植物分类学（Taxonomy of vascular plants）。在陈介研究员指导下，我完成了云南猪屎豆属的分类学修订工作。那段时间，吴先生常到标本馆看标本，我们经常可以在标本馆见到他。我曾请吴先生审阅了我的论文，原来打算将与头花猪屎豆相比较花萼上毛被较短，荚果稍超出萼外的一类标本定为一个新种。吴先生看了我的论文以后对我讲，猪屎豆属的分布中心和分化中心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在我国发表猪屎豆属植物新种要慎重为好。我采纳了吴先生的意见，发表新变种短毛头花猪屎豆以示与头花猪屎豆的区别，该文发表在武汉植物学研究上。吴先生的这些建议对于我以后的分类学研究工作很有帮助，尤其是发表新种时一定要考虑区别特征的变异状态以及其地理分布区域的特点。

1986年6月我从昆明植物所回到湖北大学，仍在植物系统学研究室工作。11月初全国孢子植物编委会会议在武昌洪山宾馆召开，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臧穆和黎兴江夫妇也来了，我到宾馆去



1990年论文答辩会后与吴先生合影



与吴先生在墨江考察（左起：李德铎、吴征镒、唐亚、李建强）



看望他们。正好得知吴先生要招收博士研究生，报上也登出了招生广告，毕列爵教授建议我报考吴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考试的时间在12月中旬，那年参加考试的有3人，除我之外，还有昆明所的周浙昆、西南林学院的李德铤。最终我们三人都被录取了。

1990年春天我在昆明植物所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证书，回到湖北大学植物系统学研究室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我在1992年向湖北大学提出去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的申请。同年秋天，吴征镒先生到武汉主持召开中国科学院分类区系工作会议，毕列爵教授和我一同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看望了吴先生，并提出去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的想法，得到吴先生的认可，并嘱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陈宜瑜关照此事。武汉植物所人事处，包括武汉分院人事处都为我去武汉植物所的事情做了努力。陈宜瑜所长专程为此事到湖北大学与湖北大学副校长赵敬钊商量，最终湖北大学才同意我去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我是1993年4月到武汉植物研究所报到的，分配在植物分类和生态学研究室工作，并任该室副主任。当时有出国进修指标，只要考试合格就可以联系出国。我马上在武汉大学报名参加了6月份的出国水平考试（EPT），成绩合格。当时我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开放实验室的客座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开年会期间，我与吴先生接触较多。我请吴先生联系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但当时该园的新实验室正在建设，后联系荷兰莱登标本馆，等了8个月签证都下不来，最后去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Stuessy教授的实验室。

此后我和吴先生接触的机会少了，只能在参加会议期间或者到昆明出差时去拜访一下。随后的这些年里，我参加了吴先生主持的《云南植物志》《Flora of China》和《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的编研工作。我想这些也可以算是对于吴先生教导和帮助我的一点小小的回报吧！

